

哲学史上克服唯理论和经验论 片面性的重大尝试——康德的认识论

徐 瑞 康

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历史中,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危害是深重的。照搬书本条条,照搬外国模式,或固守于狭隘的经验,曾使我们错误地判断中国国情,错误地制定革命和建设的路线。鉴于这一历史教训,在当今改革和开放的时代,进一步解放思想,防止和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理应是我們所面临的任務之一。如所周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理论根源正在于哲学史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因此深入地研究哲学史上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斗争及其被克服的历程,就将是富有现实意义的一项史的工作,值得我们重视和投入。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曾以庞大而严密的“批判哲学”体系闻名于史;其中尤以认识论专著《纯粹理性批判》为最。康德认识论无疑是十八世纪末德国市民在西欧反封建斗争高潮的推动下幻想发展资本主义,和在德国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安于现状、力求妥协的两重性的表现。但从史的联系看,它和前此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它是欧洲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综合”,是哲学史上企图克服唯理论和经验论片面性的重大尝试。鉴于此种认识,笔者从事康德研究,即拟述评这一“综合”、“尝试”,请读者指正。

一、批判独断论和怀疑论,强调“对理性本身进行批判”

我们看到,康德认识论的产生有很深刻的理论背景。首先,西欧大陆各国新兴资产阶级在反经院哲学的斗争中,依据自己经济、政治的需要和数学的成果,在哲学上形成了唯理论学派。唯理论推崇人的理性,强调理性比感性更可靠,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起源于理性;并主张理性演绎法。它自笛卡儿创立以来,经斯宾诺莎的完备,到莱布尼兹—沃尔夫阶段,已发展到极端片面的地步。

十八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克·沃尔夫(1679—1754)是莱布尼兹哲学的直接继承者。他的哲学把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系统化,抛弃了其辩证法因素,使其完全成为论证宇宙不变和上帝存在的学说。这种学说把现实世界视为由机械的力学规律所支配。思维和存在无矛盾的“前定和谐”系统;并称这是上帝在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所选定和构造的“最好的世界”;甚至还主张浅薄的目的论,认为“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①。这就是说,在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尚具有积极的、世俗的内容,到十八世纪,“形而上学的全部财富只剩下想象的本质和神灵的事物了”^②。而沃尔夫的这种形而上学体系又是以唯心主义唯理论为基础的。在他看来,人的思维规律(如同一律、矛盾律)是事物本身的最高规律;人的思维规定(如因果性、必然性)是事物本身的内在规定。因此,人们单凭理性就能够认识上帝、灵魂和世界,获得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上帝还保证这种知识的客观有效性。

莱布尼兹-沃尔夫哲学体系的出现表明，西欧大陆唯理论已变得十分刻板 and 片面了。它使“形而上学陷于黑暗、混乱及无效用”^③，明显地暴露了其在解决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上的恶果。实际上它在这时已发展到依靠自己的原则无法解释人类的全部知识领域了。

然而，这种体系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和德国却具有广泛的影响。它受到官方的提倡，享有“通俗哲学”的名声，一度占据着各大学包括哥尼斯堡大学的讲坛。康德早年在哲学上自然也信奉这种哲学。他的《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就富有沃尔夫唯理论的烙印。但是不久康德受德国启蒙运动的推动，对德国现存的社会制度开始不满，曾渴求他的哲学“能替一切人恢复其为人的共同权利”^④。这种不满遂引导他把矛头指向维护现存社会制度的莱布尼兹-沃尔夫的形而上学体系。康德在批判中着重指出，该形而上学体系的基本错误就在于“武断”，即它在没有事先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究竟有多大限度之前就断定：理性本身具有的主观思维范畴、规律即是事物本身的规定、规律；理性单凭自身的力量，就可以最终无误地解决“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获得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他借用“独断论”的概念来标志和斥责西欧大陆唯理论的片面发展，说明其恶果之严重犹如不事先审查和筑好地基就贸然兴建大厦一样。

其次，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在反经院哲学的斗争中，依据自己的经济、政治的需要和实验自然科学的成果，在哲学上则形成了经验论学派。经验论推崇人的感觉经验，强调感性比理性更可靠，知识起源于经验，“凡是存在于理智中的，没有不是先已存在于感觉中的”；并主张经验归纳法。英国哲学的传统便是经验主义。它自培根、霍布斯创立以来，经洛克的详尽论证，到贝克莱、休谟阶段，已发展到极端片面的地步。

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1711—1776)是贝克莱主义的直接继承者。他的哲学把贝克莱的唯心主义经验论贯彻到底，强调：“一切都不超出感觉经验”，知觉是知识的唯一对象；在知觉之外是否存在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均不可知；通过感觉经验也不能证明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获得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经验在这里，事实上，理论上，都是完全默不作声的”^⑤；人们如果来讨论人类能力所完全不能及的一些问题，那他们将“只有捕风捉影，永远达不到任何确定的结论”。这即是休谟的怀疑论。休谟的怀疑论是英国经验论发展的必然归宿。它的出现表明：英国经验论已变得十分片面了。它否认我们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必然性，明显地暴露了其在解决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上的恶果。

然而，休谟的怀疑论却和莱布尼兹-沃尔夫的独断论形成强烈的对照，使康德在思想上极受震动，打断了他的独断论的“迷梦”，给了他在思辨哲学的研究上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⑥。康德一方面接受休谟关于知识起源于经验的前提，肯定休谟关于从知觉中即在对象或事物中得不出客观的因果联系的论证，并称这些论点是休谟给知识的光明带来的“一颗火星”^⑦；另一方面又不同意休谟怀疑外部世界的存在，怀疑自然科学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企图排除“形而上学”的结论。为此他也批判休谟哲学，认为它的基本错误在于没有事先考察人的认识能力，对理性及其思维范畴的本性缺乏真正的理解，“漠视”了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他借用“怀疑论”这个概念来标志和斥责英国经验论的片面发展，说明其恶果之严重犹如游牧民族厌恶一切固定的房舍，不时地摧毁着城郭社会一样。

上述西欧大陆唯理论和英国经验论的极端发展及其恶果暴露的事实，深刻地表明了那个时期哲学和科学的尖锐矛盾：科学在长足地进展中，哲学则停滞不前。曾经为自然科学向前发展而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到十八世纪却走进了死胡同，阻碍着科学的进步。正是在此理论背景下，康德起来拯救和改革哲学，在批判独断论和怀疑论中，于1781年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认识论体系即《纯粹理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的问世标志着康德《批判

哲学》体系基础的奠定，显示了他在认识论上和前此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完全不同的方向”。

简扼地说，康德明确地主张，纯粹理性在开始实际的认识活动之前，必须先对理性能力本身进行一番“批判”。康德说的并非“对书本和体系的批判”，而乃是“从理性可以不靠任何经验独立取得的一切知识着眼，对一般理性能力进行的批判”^⑧，即判定纯粹理性有哪些认识形式；这些形式在何范围内运用能提供“客观知识”；纯粹理性能否认识自在之物。他以此把他的认识论和独断论、怀疑论相区别，并称之为“先验哲学”。其任务就在于“克服两种世界观，两种对认识问题的片面的，因而是错误的观点——独断论和怀疑论”^⑨。康德是近代第一个打出先验论旗号的哲学家。他强调，“对理性本身进行批判”^⑩，才能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提供“稳固的理论基础”，“铲除”普遍有害于公众和学派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总之，康德认识论的出发点在于“对理性本身进行批判”。它不象法国唯物主义那样把一切旧制度拿到人类理性面前来批判，这是德国市民软弱和贫乏的反映；但从理论上说，这显然是受制于欧洲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对立和发展的背景，表现了克服两者片面性的企图。

二、审察综合判断和分析判断，提出“先天综合判断”

我们知道，欧洲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之间的论争主要集中于普遍性和必然性知识的起源问题上。这一论争的尖锐化和深刻化促使康德把“科学的客观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定为他的认识论的中心问题。而康德对此问题的解决则涉及他对科学知识本身的理解。

康德从逻辑学的角度谈论人的认识，认为认识通过判断来表达（如“桌子是四方的”），单个的观念（如“桌子”、“四方”）不构成认识。他按照主宾词的关系把判断又区分为两种，并加以审察。一为“综合判断”，这是主宾词之间没有同一性，宾词原在主词之外的判断（如“天是热的”）。这种判断起源于经验，即是我们借助于直观或感觉，运用综合的方法，把宾词加于主词上而得到的，属后天的判断。它是扩展性的，即能扩大我们的知识范围，增加新的知识内容，故称扩充的判断；但不具有严格的普遍性和绝对的必然性，因经验是个别的和偶然的，通过归纳也只能达到比较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另一为分析判断，这是主宾词之间具有同一性，宾词原蕴含于主词之内的判断（如“一切物体都有广延性”）。这种判断起源于理性，即是我们根据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矛盾律，运用分析的方法，从主词中分解出宾词来而形成的，属先天的判断。它是解释性的，即仅说明固有的知识，不增加新的知识内容，故称说明的判断；但却具有严格的普遍性和绝对的必然性，它既然不依赖于任何经验，逻辑上在任何经验之先，所以在任何条件下就都是适用的。康德在此按主宾词关系即从知识起源的角度区分综合判断和分析判断，指出它们的优点和弱点，这是其独创。在他看来，经验论所谓的知识即由后天综合判断构成，唯理论所谓的知识即由先天分析判断构成。实际上它们“各执一端”，各有优劣：能扩充知识内容的，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不能扩充知识内容。单个地说，它们都不能说是“客观知识”。

那末什么是“客观知识”呢？康德经过多年的“沉思”，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这种判断（如“热使物体膨胀”）是综合的即起源于经验，经验为判断提供材料（如物体、热等）；这能使判断具有新的知识内容。这种判断又是先天的即起源于理性，理性为判断提供形式（如因果性）；这能使判断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换言之，康德所谓的“客观知识”仍由先天综合判断构成，这种知识与唯理论和经验论所谓的知识都不同，既能提供新的知识内容，又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是指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经验知识。这即是康德对科学知识的特殊规定。

对康德说来，先天综合判断的存在是“无可争辩”的。他说过，“我们有确实把握能说某些纯粹先天综合知识是实有的、既定的，例如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⑩。他还证明：几何学命题如“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是先天综合判断。因“直”属质的概念，从中分析不出“最短”这量的概念来，只能藉在平面上两点之间的种种线条的比较，在直观中得到它；同时两点之间的直线又普遍地必然地最短，这种普遍性必然性不可能来自经验。物理学命题如“在物质世界的所有变化中，物质的量保持不变”是先天综合判断。因“不变”这概念是我们凭直观后天加到物质这概念上去的；同时在物质世界的所有变化中物质的量又必然地保持不变，等等。实际上康德之提出先天综合判断仍与当时欧几里德几何学和牛顿力学的受推崇有关。康德发现它们既依靠感性经验提供材料，又都能适用于一切经验对象，具有普遍必然的客观有效性。据此他才从哲学上提出先天综合判断以表达他对科学知识的特殊理解。

康德对科学知识的理解表明，他不能容忍把科学知识看作不具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象休谟那样，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把前后观念的习惯性的联结视为必然性，他是不赞成的。在他看来，“普遍性和必然性是使知识具有客观性的必要保证”；“当严格的普遍性属于一个判断的本质方面时，这就指示出一种特殊的知识来源，即先天知识的能力。因此必然性与严格普遍性是先天知识的可靠标准，是彼此不可分的”^⑪。但他又声称，单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也不就是科学知识。他曾针对沃尔夫唯理论说，若不是对象刺激我们的感官，构成关于对象的认识即经验，我们的认识怎能获得新的内容呢？黑格尔曾指出，先天综合判断“形成了对立者的原始的联系”^⑫。确实，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凝结了他把诸如先天和后天、分析和综合、个别和普遍、偶然和必然等“联系”起来的企图，乃是他在科学知识的规定上“综合”唯理论和经验论，克服两者片面性的突出表现和结果。

三、反对把概念感性化和直观智性化，主张思维和直观的“联合”

康德提出先天综合判断为他展开认识论体系提供了前提。他把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归结于下一问题中：即先天的综合判断何以可能？”^⑬康德声称：“形而上学站得住或站不住，从而它是否能够存在，就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⑭对他来说，这个问题的解决与否事关摧毁旧的和建立新的“形而上学”问题。因而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以大量篇幅来阐述这个问题，这即是他关于认识过程的学说。

如所周知，康德按人的认识能力，把人的认识过程分为三阶段即感性直观、悟性思维和理性综合；并指出通过认识的前两阶段，我们才得以形成先天综合判断，获得科学的“客观知识”。按照康德的说法，感性直观就是主体通过感性对对象进行直观即运用先天形式接受对象刺激，赋予表象以一定限量的活动，它是人的认识的第一阶段。他在这里一方面承认自在之物是客观存在的，它作用于人的感官能在心中产生表象，是人的感觉的来源；另一方面又认为感性本身固有一种“纯形式”即时间和空间，它们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起源于理性，是先天的。他强调感性表象唯有赋予感性直观的纯形式时间空间，才能具有并存和先后的关系，出现于人的意识中。他还指出，在感性直观阶段获得的认识乃是知觉或单个的观念。这种知觉由感性表象(质料)和时间空间(形式)两种因素构成。它与自在之物仅有某种来源关系，而没有任何反映关系；只是关于个别现象而不是关于自在之物的认识。

康德认为，感性直观提供的尚不是科学的“客观知识”，人的认识必须上升到悟性思维阶段。悟性思维是主体通过悟性运用先天形式对知觉或单个的观念加以整理、统一的活动。他

在这里一方面认为感性直观为悟性认识提供质料，知觉或单个的观念就是这样的质料；另一方面又主张悟性本身固有一种“纯形式”即范畴（如因果性、实体等），它们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起源于理性，是先天的。他强调悟性思维的纯形式范畴是悟性认识的工具，悟性唯有运用它来整理和联结感性所提供的纷杂的知觉质料，才能完成这阶段的认识。他还指出，通过悟性思维阶段所形成的认识就是先天综合判断。这种判断由知觉或单个的观念（质料）和范畴（形式）两种因素构成，它们分别是这种判断所以可能的条件和根据。这种判断即科学的“客观知识”只是关于现象世界而不是关于自在之物的知识。

由此可见，康德在回答科学的“客观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时，实蕴含了感性和悟性相区别和联合的重要思想。康德确认，感性和悟性这两种认识能力有显著的区别。1. 与对象（自在之物）的关系不同。感性是直观活动的能力，它“直接和对象发生关系”，在直观中对象直接地被给予我们；悟性是思维活动的能力，它与对象的关系是间接的。2. 在职能上不同。感性的职能在于为客观知识提供感性材料；悟性的职能在于思维和整理这些感性材料，以形成“客观知识”。3. 在性质上不同。感性是“通过我们被对象所刺激的方式来接受表象的能力”，是认识中的被动因素；悟性是运用范畴整理感性材料以产生知识的能力，是认识中的能动因素。他指出，不能把这两种能力“混淆”起来，而应“把它们仔细地分开”，“把关于一般感性的规则的科学——感性论同关于悟性的规则的科学——一般逻辑加以区别”^⑩。

但是康德强调，鉴于这些区别，要获得科学的“客观知识”，就必须把两者“联合”起来。他说，“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只有当它们联合起来时才能产生知识”^⑪。在他看来，既然在认识过程中感性和悟性“实无优劣”，各有其性质和功用，我们对于这两种能力中的任何一种就都不能“偏爱”而漠视另一种。感性和悟性是“吾人之知识，发自心之两种根本源流”；“由于前者，有对象授与吾人，由于后者，对象与所与表象（此为心之纯然规定）相关，而为吾人所思维。故直观及概念，乃构成吾人一切知识之要素”^⑫。单有感性不行，因感性不思维、不具有概念；单有悟性也不行，因悟性不直观、不具有对象。我们必须一方面“在直观中以对象加于概念”，用对象来充实概念；另一方面“以直观归摄于概念之下”，用概念来整理对象。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先天综合判断，获得科学的“客观知识”，就如在建筑过程中砖瓦和水泥必须结合起来才能构成房子一样。

上述康德关于感性和悟性相区别和联合的思想无疑是对十七世纪以来经验论和唯理论在知识形成问题上的片面观点的。在此问题上，洛克把“概念感性化”即把理性认识生硬地归结为感性知觉了；莱布尼兹把“直观智性化”即把感性认识看作理性认识的低级或模糊的阶段了。两者都不了解只有感性和悟性的联合才能产生关于事物的科学知识。诚然，康德仍未能正确地解决感性和悟性的关系问题，但他终究吸取了唯理论对普遍性和必然性探索的成果和经验论对人类知识扩展的成果，尝试着实现对它们的综合，克服它们在这个问题上“各执一端”的观点，向辩证地解决这个问题接近了一大步。正是以此思想为基础，康德才得以按自己的方式解决科学的“客观知识”何以可能这个认识论的中心问题。

康德通过感性直观和悟性思维学说论证科学的“客观知识”何以可能，旨在说明数学和自然科学作为科学何以可能？我们知道，数学以时间、空间为研究对象，自然科学以自然的因果律为研究对象。而按照康德的说法，时间空间或因果性都是纯粹理性固有的形式，这些形式具有“先验的观念性”，即先于经验，起源于理性；又具有“经验的实在性”，即离开经验材料，它就毫无意义。因而这些形式乃分别是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所以可能的根据。正是运用这些形式于经验材料，一切数学命题或自然科学原理才是先天综合判断，数学和自然科学才

成为可能。康德关于感性直观和悟性思维学说实为数学和自然科学作为科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当然，由于他讲的数学和自然科学最终是从先天的认识能力而来，以先天形式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来保证其“客观性”，而并非“从现实世界中得来”，因此他还是持唯心的科学观。

康德通过感性直观和悟性思维学说对科学的“客观知识”何以可能的论证，原属总结当时欧几里德几何学和牛顿力学成就的结果；现在他又以此论证数学和自然科学作为科学何以可能。这说明他确立了科学在认识论中的重要地位，并按自己的方式杜绝了休谟怀疑论否定规律、否定科学的片面观点；也为否弃莱布尼兹-沃尔夫独断论的形而上学“假学问”准备了条件，从而进一步体现了他对经验论和唯理论片面性的克服。

四、对唯理论和经验论“综合”的调和性质和能动思想

由上可见，康德认识论(出发点和中心内容)乃前此的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综合”。这种“综合”实是西方哲学史上克服唯理论和经验论片面性的重大尝试，有许多值得思索的地方。

我们看到，康德在谈论科学知识问题时曾把它分为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并从根本上加以隔开。知识形式和知识内容是康德认识论的两个基本概念，可以说这是理解康德认识论实质的关键之一。如他从经验论原则出发，认为“一切知识始于经验”。这实指知识内容起源于经验，是自在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的结果。这显然是康德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如他从唯理论原则出发，认为并非“一切知识皆自经验发生”。这实指知识形式为人类理性先天所有，是人类知识所以可能的根据。这显然是康德认识论中的唯心主义因素。可见，康德所谓的科学知识最终并无统一共同源泉，乃具有两个各自独立、二元对立的源泉：自在之物和理性。他之阐述感性和悟性的关系乃与思维和存在的二元论观点相联系。这就决定，康德对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综合”，不过是两种来源各不相同而互相割裂了的感性认识和悟性认识形而上学的外在的结合。实际上要建立来源各不相同的认识的异质的统一，必然有赖于这样的“综合”。这样的综合其实质在于“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康德还在谈论知识对象问题时，把对象分为现象和自在之物，并从根本上加以隔开。现象和自在之物是康德认识论的两个基本概念，可以说这是理解康德认识论实质的又一关键。如他不同于休谟，确认自在之物的存在，并视之为感觉的来源。对他来说，若没有“自在之物”，就不会有感觉，不会有必然被悟性的综合机能导致统一的杂多，因而也就不会有对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解决，不会有他的认识论本身。但他又断言，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因自在之物一旦作为对象呈现于人的面前，就已经过先天形式的整理和改变，非本来的面目，是现象了。他强调，现象和自在之物根本不同，是在认识中构建的，离不开认识主体，非自在之物的客观显现；我们的科学知识只是关于现象的知识。诚然，人的认识还可上升到更高的理性综合阶段，理性按其本性企求超越现象范围，认识自在之物；但理性本身又是“真理幻相的源泉”。理性在企求认识“世界”等自在之物时必然会产生“二律背反”等幻相。它们的出现表明，认识应回到现象范围里来，科学知识的任何扩大和深化都不能超越现象领域。可见，康德之阐述感性和悟性的关系又是与自在之物不可知的观点相联系的。确切地说，康德认识论的归宿点就在于自在之物不可知。这样，康德通过对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综合”，一方面肯定了科学本身；另一方面又把科学限制于现象领域，从而贬损知识，为宗教信仰留下了地盘。这样的综合其实质在于调和科学和宗教。

总之，康德对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综合”具有鲜明的“调和”性质，它显示了康德认识论本质

上是折衷主义的混合物。由于康德的先天形式被认为是科学知识所以可能的根据，自在之物是超验的、彼岸的，所以它的主导方面是主观唯心主义。毋庸置疑，康德在这里区别知识形式和知识内容、现象和自在之物，包含有注重知识内容的经验起源和知识形式的认识功能，对自在之物达不到穷尽的认识和把上帝从知识领域中排除出去等合理因素，但终究这种“调和”是其认识论的致命弱点，是他不能真正地克服唯理论和经验论片面性的根本障碍。

“综合”是康德认识论的重要概念。我们看到，康德对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综合”蕴含令人瞩目的主体能动性思想。他曾说，“所谓综合，在最一般意义下，我理解为把各种不同的表象放在一起，并把它们中的杂多在一种知识中加以把握的活动”^⑩。这就是说，他的综合本身并非是把唯理论和经验论各自片面强调的悟性和感性两者被动的机械的相结合，如贝克莱、休谟把认识看作消极地联结观念，或如那个时期的唯物主义把认识看作镜子似的被动反映；而乃是主体运用悟性思维先天形式能动地整理统一感性材料以形成科学知识的過程。康德十分强调主体的能动功能，曾把统觉的原始综合统一视为人类知识范围中的“最高原理”，说明悟性的先天综合统一性才使科学的“客观知识”成为可能。他对主体能动性的确认也富有特点和内涵。首先，与“范畴”的观点相联系，强调认识主体不仅有生理方面的先天机能，还有实际上是由已知的科学知识原理凝结成的范畴作为认识工具，从而使他的认识论具有和“逻辑学”相结合的成分。其次，与“矛盾”的观点相联系，强调认识主体在对悟性所提供的“先天综合判断”作最高综合、企求认识自在之物的能动进展中必然地会出现“二律背反”的现象，从而使他的认识论具有和“辩证法”相结合的成分。再次，与“构造”的观点相联系，强调认识主体在认识的能动活动中同时构造认识对象，“为自然立法”，突出了认识对象受认识主体制约的方面，从而使他的认识论具有和“本体论”相结合的成分。

总之，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康德是近代哲学发展中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主体能动性思想的哲学家。这一主体能动性的思想乃是他对当时整个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科学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的理论概括和表达。这是他的认识论中最主要的合理因素，是他对西方认识论发展的最积极的理论贡献。毫无疑问，在康德那里，主体能动性根源于纯粹的先验的统觉，离开实践和实际的认识过程来谈论人的认识，从而是“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性方面；他还主张唯心主义的先验逻辑，承认理性矛盾的必然性而否认理性矛盾的客观性，对主观和客观、知识和对象的关系作了“颠倒”的解决，等等。这一切都是他的局限方面。但终究这一主体能动性思想是他得以综合唯理论和经验论成果，尝试克服两者片面性的关键性的论据，为后人在实践观点的基础上辩证地解决感性和理性关系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理论遗产。

人们曾说，康德认识论是西方认识论史中的转折点。其实这“转折”正在于，它作为欧洲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综合，既是康德按自己的方式对两者的终结，又是康德按自己的方式对两者的超越，开始了德国古典哲学。而就其现实性而言，可以说，这一综合所表现出来的克服唯理论和经验论片面性的尝试和趋势，无论是其优点或弱点，都是我们今天在解放思想、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过程中所值得思索和借鉴的。

注释：

-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2页。
③④⑩⑪⑫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8、38、70、85页。
④ 斯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第39页。
⑤ 休谟：《人类理解研究》第135页。

- ⑥⑦⑩⑪⑫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9、6、119、31、33页。
⑧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第239页。
⑨ 古留加：《康德传》第100页。
⑬⑭⑮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31、58、58页。
⑯ 黑格尔：《小逻辑》第117页。